

史学论集

●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

● 吉林大学出版社

前 言

这本《史学论集》，是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近期的史学论文选集。承蒙吉林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出版问世了。

本系是曲阜师大的一个老系，但长期以来它的规模并不大，近几年才有了明显的发展，这与它的具体经历有关。它的前身是山东师专历史科，原在济南，组建于1955年春，当年秋季招生。1956年山东师专改为曲阜师院，迁至曲阜今址，同年将历史科改建为历史系。1985年秋曲阜师院升格为曲阜师大，历史系仍实行系、科双规制教学计划。本系所经历的35年是不平凡的。它自组建不久，便不断受到“历史无用”论等错误思潮的干扰，从1963年春开始，曾两度与本校政治系合并，后又与山东大学历史系、政治系合并，名为政史系，实则取消了历史专业，停止了历史教学。至于科研，这期间更是长期不绝如缕。虽有个别教师在建系初期出版或发表过少量论著，但完全处于自发状态，既无人组织，也没什么规划。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才给我系以新的生机，于1979年又恢复了历史系的建置，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经过几年的努力，师资力量逐步得到加强，教学设备正逐步向现代化发展，科研队伍也开始茁壮成长。首先，大家在思想认识上有所提高，能正确认识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的关系；其次，在组织措施上也比较得力，诸如系行政能及时组织教师

搞好科研项目规划，提倡与各自专业有关的科学研究，每年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编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进行内部交流等等，从而逐渐改变了过去忽视科研的偏向，由过去的自发状态逐渐向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科研的方向发展。因此，十年来我系曾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其中有堪称填补某一学术研究领域空白的个人专著，有为不少高校长时间采用的协作教材，也有省属古籍整理规划中的重点研究项目，更有数量可观的一批史学论文。这些论著，从学科属性上说，分别属于中外历史的不同学科；从时间断限上看，涉及到古、近、现各个不同的时代；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通过不同的层次，围绕着本系基础课程的设置，对各学科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研究，最终落实到为专业教学服务。

我们的成绩是应当肯定的，但在开展科研的过程中却并非一帆风顺，我们曾不时遇到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或挑战，我们是在不断排除干扰、克服困难的斗争中前进的。如几年前曾有过所谓“史学危机”的思潮。当时史学界有人认为，建国以来史学界没有什么建树，也没有什么出路；他们大谈要用新方法来研究历史，要打破过去狭窄的研究范围；他们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已经过时；等等。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是史学理论的最高发展阶段，没有什么更高超的史学理论能取代它。我们对新方法表示欢迎，但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新方法。我们认为历史学本身并不存在什么“危机”，就历史学研究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看，它是一门永远研究不完的学科，也没有什么“危机”。相反，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史学研究的某些方面还是颇为繁荣的（当

然，这只是在史学界内部的繁荣）。同时，我们也认为，建国以来的史学研究中的确存在一些缺点，例如不能用辩证法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犯有教条主义的错误，因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善于用辩证法，不善于把理论运用到历史研究的实际中去，而往往用形而上学处理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属于缺点范畴，与所谓史学理论“危机”有着根本区别。对这些问题，只是如何加以克服，如何学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进而把理论与方法发展到更完善的地步的问题。我们是这样认识的，并努力加以实践，从而把这种错误思潮对青年学生和科研工作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使之减少到最低限度。

再如，曾受到“历史无用”论的干扰。本来，“历史无用”论的幽灵，建国以来在史学研究中曾几次出现过，近年又出现了新的“史学无用”论。它之所以出现，诚然与人们未能正确认识历史科学的价值，未能充分认识它的功能有关，但史学研究的本身存在一些缺点，并且常时间未能克服，也是原因之一。因为一个学科的产生、发展、繁荣或曲折、衰落，固然是受诸多社会条件及学科内在原因的制约，但对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具有决定意义的，乃是社会的需要和该学科对社会需要满足的程度。可是近十年来史学发展的实际，从总体上看，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前史学模式的深化、观念的某些修正以及外延的扩大，而没有和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于是史学研究被抛到了时代的后面。我们认为，史学研究的突破，在相当大程度上固然要依赖于史学界之外的大环境的改观，但史学界本身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史学工作者应当投身生活，面向社会，特别是从

事近现代以及当代史研究的人，要走出书斋，投身社会，才能更准确、更深刻地把握时代的脉搏，把握研究的课题。因此，我系教师决心与广大史学工作者一道，努力更新史学观念，改进工作方式，为史学研究的改革贡献自己的力量。

再者，还有一个困扰我们的问题，那就是学术著作，特别是史学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近几年来越来越突出了。这个问题的出现及其日趋严峻，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的、社会的原因，有出版的政策、税收政策、发行渠道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勿庸讳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竞争机制、利益机制、市场机制的浪潮的冲击，价值观念的改变，一些出版社过于看重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例如，学术性强的历史著作往往在一些出版社根本排不上名次，尤其是古代史由于距离现实较远，更是不被重视，致使一些优秀的史学著作无法问世，使史学界陷入困境。但纵有某些出版社比较讲求社会效益，不惜亏本，对某些高质量，确有学术价值的史学著作肯予出版，可是出版以后又遇上“销书难”，出版界也很苦恼。要摆脱这种困境，让学术性的历史著作找到它应有的出路，一些带全局性的问题必须解决，诸如进一步调整出版政策，在去邪扫黄的同时，注意综合治理。这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自然绝非单纯史学界甚至包括出版界在内的有限力量所能济事，更何况单纯高校中为数有限的历史教师的绵薄之力呢！但我们历史教师要积极支持并配合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各项工作，起码不应为了出版什么“书”，不能为了追逐出版什么“畅销书”，在史学研究中去搞“短期行为”。即绝不搞缺乏长远目标，只追求近期的成果，只追求尽快地拿出论著的那种

“急功近利”的研究方法。因为史学研究中的这种“短期行为”，是有害于历史科学发展的。目前在史学研究中的确存在着不少的“短期行为”的现象，它是由于体制和政策中的一些规定和问题诱发的，并非是多数史学工作者愿意追求的。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克服和注意防止。

在如何摆脱“出版难”的困境，为学术性的历史著作找到应有的出路的工作中，我们认为，历史教师能做的工作主要有两点：一是要尽量把自己的研究贴近时代，把握研究的课题，在一定范围内的（并非一概而论）史学论著要注意其可读性。前面已经提到，从事近现代以及当代史研究的人，如果能投身社会，使自己的研究贴近时代，自然是不难做到的；就是从事古代史的同志，如果能从“古为今用”的原则精神出发，多研究一些与中国命运休戚相关的问题，如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改革进行深层次的总结，给以“历史的启示”，也算是贴近时代，并可更好地把握自己的研究课题。另外，注意史学著作的可读性，也很重要。因为史学研究的成果是以各种著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的功能则是以作用于社会而反映出来。如果以不同的读者对象来区分史学研究成果的话，则有以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或是哲学家、思想家等各方面的专家为读者对象的，有以普通群众为读者对象的。由于读者对象不同，因而史学著作的内容、形式、功能也都各异，但都要提高各自著作的社会功能，要有益于国计民生，要有功于四化建设，这点则是共同的。要更好地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还是让史学著作能获得更多一些的读者为好。要达到这一目的，便要求在一定范围内的多数史学著作除具有科学性（或曰学术性）外，还要有一定的可读性。我国的

史书撰著，历来有注重文采即字句词章的优良传统。我们认为，除了史料考订、古文字研究、考古发掘报告等等学科或课题外，对大多数的史论、断代史、专题史、人物传记等著作来说，都要求在尊重史实即科学性的基础之上，力求讲究点文采，使之具有一定的可读性，这不仅是应当的，也是可以做到的。二是要求历史教学和研究单位，特别是负责领导工作的同志，应从弘扬祖国历史，为精神文明建设多贡献力量的战略高度着眼，在自己财力许可的情况下，尽力支持、资助本单位的科研工作，使其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能得以出版或发表。

对此，有的单位已经率先垂范做了，曲阜师范大学就是其中行动较早的一个。它于1988年即制订了《关于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的暂行规定》，并已资助过两批学术专著的出版，从而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目前历史系正在把我校这一有意义的措施加以发展，即在本系经费并不充裕的情况下，决定拨出专款，资助本系教师史学论文的出版。前不久已由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和教师代表组成“论文选编小组”，进行认真的选辑，按照论文的内容，以先中后外，由古而今的原则进行编排，编成了这本《史学论集》，奉献给读者。其中个别文章观点系属探索性的，如有不妥之外，还望批评指正。本集限于篇幅，还有一些好文章未能入选，深以为憾，请教师同志谅解。

本集的出版，得到国家教委、吉林大学出版社和“国史丛书编委会”主任编委柏福临同志的支持，于此一并谨表谢意。

李季平

**1990年10月于曲阜师大
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室**

目 录

前言	李季平	1
鲁国与周礼	郭克煜 陈 东	1
齐国婚俗的几个问题	梁方建	11
诸葛亮功过述评	孔令彬	20
评“六家二体”说	许凌云	36
论唐初清新的民族观念与民族政策	付永聚	49
唐代学校	杨荫楼	62
崔融浅论	王洪军	75
唐王朝对佛教的扶植与控制	张迪亚	89
试述大顺政权的特点	杨绍溥	105
王应麟学风简论	魏殿金	121
宫廷斗争漫议	张承荣	133
鸦片战争后买办经济发展的最初趋向	罗大正	140
范旭东与中国化学工业	赵葆惠	153
“办而不包，退而不出”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 义的策略方针	孔凡岭	165
试析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的几个问题	王作坤	178
评析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三条道路”	崔薇圃	191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土地政策剖析	袁素莲	204
略论魏德迈来华“调查”及其对美国的对华政 策之影响	李黎明	215

关于生产关系基础问题的札记·····	李永采	228
跳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由来及其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中的地位		
——兼与张奎良先生商榷·····	王明星	247
塔西佗史学特点简析·····	郭长刚	261
浅谈地理环境对雅典经济发展的影响·····	许敬民	272
中世纪基督教与西欧文化·····	朱立	282
威廉·塞西尔的经济政策·····	夏继果	295
近年我国中古史学对西欧封建社会 的重新认识·····	顾奎斋	309
论普鲁士两代国王的改革·····	聂仲元	326
美法“准战争”前后约翰·亚当斯总统的外交 政策述论·····	李胜凯	339
“西进运动”与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	刘淑敏	355
植木枝盛的国家观·····	张兆敏	371
简析日本对东亚殖民统治的特点及影响·····	罗志民	384
日本出兵山东与日本人民的“反对干涉中国” 运动·····	黄尊严	395
从列宁的革命妥协理论评苏德互不 侵犯条约·····	郝承敦	407
当代拉美阶级合作主义述评·····	夏立安	414

鲁国与周礼

郭克煜 陈 东

鲁国与周礼的关系密切，“周礼尽在鲁”的典故也为史学界所熟知。但是，有关的专门论述还不多。这主要是因为要详细地考察周礼究竟包含哪些内容，鲁国又保存了多少周礼、周礼在鲁国又起到了什么作用等问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本文力图对周礼作一初步的归纳与概括，并且通过鲁国这一实用周礼的典范，考察一下周礼与鲁国的关系，以期能加深对周礼以及鲁国史的理解与认识。

一

要考查周礼与鲁国的关系，首先要明白周礼究竟是指的什么。对周礼的解释历来说法不一。自《周礼》、《仪礼》《礼记》以至清人的通礼之书，无不是后人对周礼的探讨。周礼的内容异常广泛，人们对周礼一词的含义也有不同的理解，要对周礼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只能给它规定一个大致的范围。

首先，礼与法是并列的，礼治与法治同是统治者统治、管理社会，维护其政治制度的一种政治手段。所谓礼即“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政之舆也”^①。这是礼的本质属性，周礼自也不能例外。

相对于夏礼，殷礼而言，我们认为周礼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是周礼的内容空前地复杂与细致。这当然与社会的发展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周代统治者的政治思想对周礼格外重视。《礼记·表记》载：“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这表明汉代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三代政治的不同。由各种迹象都可以推断，殷人在政治上是重法治的，传说“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②。周人在政治思想中则是崇尚“德政”，重视礼治，以求“敬天保民”。这种尚德重礼的习俗在周人有关太王让郊的传说中就有所表露。克殷以后，周公“制礼作乐”，从而确定了以礼治为主的政治指导思想。周礼的第二个特点是重亲亲、重等级。这则是由周人的宗法制与分封制决定的。

周礼的具体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概括来讲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礼义”，是指抽象的礼的道德准则。“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是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③。礼是规范人们社会活动的行为准则。它与法不同，主要不是由外力强制约束，而是靠内力，即所谓自身修养，以道德自律。“薄于德，于礼虚”。为此，统治者制出诸如忠、孝、仁、义等道德戒律，以作为礼的标准。周礼有所谓“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以作为各级人物行礼的准则，

要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①。这些道德名词虽然是古已有之，但在周礼又有不同的份量。周礼重亲亲，而后才及尊尊，先父慈与子孝，而后才有君仁与臣忠。由孝而推论及忠，由人伦推及君，这使周礼相对而言有不少的人情味。

其次是礼仪或礼节。周礼的礼节名目繁多，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称。主要分吉、凶、军、宾、嘉五类，《仪礼》一书中多有追述。这些礼仪都是本着孝、忠、信、义等准则推衍而来的，其目的则是为了“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如葬礼方面规定“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日，外姻至”^②。这显然是为其等级制度服务的。丧服方面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之分，则是为别亲疏的。

其三是礼俗，即周人的社会风俗与道德习惯。它较礼节更细且繁，但并没有硬性的规定。当然也是受礼义的影响，间接地为周的政治制度服务的。如“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民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又如“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车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车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车乘骊，牲用骍”^③。

周礼内容广泛，其中自有主次之分，但其本质是一致的。为周王朝的政治统治服务是其根本目的，礼义、礼仪与礼俗仅是其抽象的或具体的，明文的或不明文的表现形式而已。春秋时期的学者常把“礼”与“仪”分开，其所谓“礼”便是指周礼的本质；其“仪”则是指周礼的具体表现形式。鲁昭公五年（前537年），昭公如晋，自郊劳至于

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叔齐答曰：“鲁侯焉知礼！”晋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亦等于礼，不亦远乎？”①

二

鲁国与周礼的关系十分密切。它是春秋时期保存周礼最多的诸侯国。当时有“诸侯于宋、鲁观礼”的说法，宋礼自然是殷礼，而鲁保留的则是典型的周礼。《左传》昭公三年，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孔子也曾叹，“吾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

鲁国之所以较多地保存了周礼，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西周初年，在系统而又详备地制订周礼的过程中，周公旦最为有力，故有“周公制礼作乐”的传说。伯禽则是亲聆其父教。《礼记·文王世子》载：成王年幼，“周公相，践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说伯禽受到的教育是周世子的教育可能是一种传说，但可以说伯禽之接受周礼是作为家礼来接受的。因此，鲁人对周礼别有一种亲切感，“先君周公制周礼”成为他们的口头语，在行动上也容易习以为常。入东周以后，“礼崩乐坏”，鲁国却有不少知礼之人。诸如

孔子、曹刿、夏父展、展禽、臧僖伯、申繻、叔孙豹、子服景伯乃至匠人庆等，都以知礼而闻名于世。第二，也是因为周公的缘故，周天子特许鲁保留了天子之礼。《史记·鲁周公世家》说：“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礼记·明堂位》载：“成王以周公为有助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礼乐。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路，载弧韞，旗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周礼是为周王统治天下而制定的，天子之礼至尊至贵，自然是周礼中重要的部分。行天子之礼的特权与特殊的礼器、礼仪，正定鲁国得以较多地保存周礼的有利条件。这对于其他诸侯国而言是难以企望的。宋与杞虽也保留了郊礼，但却是作为亡国之社而存在的，其意义又不同。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士人学习天子之礼也只好多求于鲁。如“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鲁，墨子学焉。”⑥。

这样，主观与客观条件的结合，鲁国便成了典型的周礼的实施者。周礼虽是由周王室制订的，但是具体到各诸侯国，其实施情况大不一样。《礼记》虽载：天子五年一巡狩，视察各国，“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其制度礼服者为叛，叛者君讨”，但同时又主张“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故而各诸侯国在政治制度一致的基础上，具体政治措施却大不相同，对周礼也是各取所需。杞、宋显然是沿袭了夏、殷礼俗，即所谓“存亡国继绝世”。即使在周初分封的同姓国中也不强求一致。如封康叔于卫是“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封唐叔于夏墟则是“启以夏政，

疆以戎索”。其他各国也都是因地制宜，唯独鲁国“法则周公”，坚持比较全面地推行了周礼。《史记·鲁周公世家》载：“鲁公伯禽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于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而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这表明鲁与齐不同，鲁更多地变革了当地礼俗，全力推行了周礼。《说苑·政理》有一段相似的记载，更能说明问题。“伯禽与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国。三年，太公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疾也？对曰：尊贤，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五年，伯禽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难也？对曰：亲亲，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

“亲亲”正是周礼的特色。鲁显然是沿用了周的以礼治为主的政治思想，使得周礼得以较为全面地在鲁国保留下来。

在承认鲁国比较全面地实施了周礼的同时，也必须明白，“周礼尽在鲁”并不完全排除其他礼俗也在鲁。这首先因为周礼本身就是继承了夏、商礼而来，其中也保留有不少夏商的礼俗。如“有虞氏瓦棺，夏后氏璽周，殷人棺槨，周人墙置斂。周人以殷人棺槨葬长殇，以夏后氏之璽周葬中殇、下殇，以有虞氏之瓦棺葬无服之殇”^④。再者，曲阜一带原商殷重镇，鲁国统治者完全用周礼改造旧奄民与殷民六族也是不可能，故鲁在建国之初，在立有国社的同时也建有亳社，显然殷的旧礼俗也并没有完全改掉。

说鲁国比较多地保存了周礼，并不意味着鲁人一直坚守着周礼而无所变更。随时代的变革，鲁人对周礼也有所损益。由《春秋》的记载可知，鲁国也有不少违背周礼的地方。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人为的。周礼是禁锢人的七情六欲的，

然而人情又是在所难免。当情与礼冲突激烈时，对礼制也就有所不忌了。如为争夺权位，兄弟骨肉相残，幽公弟潞杀幽公、伯御杀懿公、桓公杀隐公，庆父杀公子斑及国公都是如此。因为“人本好色”，所以穆伯为襄仲迎妇于莒而自娶之；吴女貌美，昭公也就顾不上“同姓不婚”了。另一种违礼情况是促于时势所迫，不得不然。哀公之妾死。哀公为之齐衰。有若曰：“为妾齐衰，礼欤！”哀公曰：“吾得已乎哉！鲁人以妻我。”这件事情当然是一个借口，但也确实有不得不行“非礼”的时候。《礼记·檀弓上》载：“襄公朝荆。（楚）康王卒。荆人曰：‘必请袭！’鲁人曰：‘非礼也’荆人强之。”鲁人也只好照办。又如《左传》哀公七年载：“公会吴于郕。吴来征百牢。子服景伯对曰：‘先王未之有也’。吴人曰：‘宋百牢我。鲁不可以后宋。且鲁牢晋大夫过十，吴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晋范鞅贪而弃礼……若以礼命于诸侯则有数矣。若亦弃礼，则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下之大数也。今弃周礼，而曰必百牢，亦唯执事。’吴人弗听。景伯曰：‘吴将亡矣，弃天而背本。不与，必弃疾于我’。乃与之”。在“礼崩乐坏”的东周时期，鲁国要洁身自好也是不可能的。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春秋后期鲁国也推行了“初税亩”、“用田赋”等一系列社会改革，对周的政治、经济制度也有所变革，更不用说周礼了。鲁人对周礼的态度自然也有不小的变化。孔子坚持“克己复礼”，沉溺于周礼而不能自拔。其孙子思便已不同，对周礼已是持一种比较通达的态度。子思之母死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观乎礼。子盖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

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⑩由此可见，周礼在鲁国也有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

三

周礼作为一种政治统治工具，对鲁国的政治起到了稳定作用。整个西周时期鲁国的政治地位显赫，直至春秋初年，鲁国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有利必有弊，正是周礼的这种稳定与禁锢作用与守旧意识，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鲁国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致使鲁国终于落后于其他大国，自春秋中期以后便一蹶不振。后期的鲁国则是依其周室的地位与周礼，玩弄外交礼节与手段，延缓了它覆灭的命运。这时的周礼，无异是鲁国的强心剂。

鲁闵公年间，“齐欲伐鲁。齐公问仲孙湫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⑪鲁秉周礼为什么就难取呢？这主要是因为周礼起到了一种协调人心的作用。对统治者内部，周礼起到防止与调节其矛盾的作用。鲁公孙敖丧。襄仲素与之不和，欲勿哭。惠伯曰：“丧，亲之终也。虽不能始，善终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至美，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子无失道，何怨于人。”^⑫襄仲悦，帅子弟以哭之。对于下层人民来说，周礼既有摄服的威力，同时也起到了收罗人心的作用。相传“鲁国之法，鲁人有贼臣妾于诸侯者，取金于府”。这种举动无疑会缓解统